

文化动线视角下的赛珍珠现象研究

走向世界的中国 与世界主义的赛珍珠

董晨鹏 著



本书为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重大课题资助项目

Pearl S. Buck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重大课题资助项目

董晨鹏 著

走向世界的中国 与世界主义的赛珍珠

文化动线视角下的赛珍珠现象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世界的中国与世界主义的赛珍珠:文化动线视角下的赛珍珠现象研究/董晨鹏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321-4951-3

I. ①走… II. ①董… III. ①赛珍珠, P. S. (1892~1973)-人物研究
②赛珍珠, P. S. (1892~1973)-文学研究

IV. ①K837.125.6②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4702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周志武

走向世界的中国与世界主义的赛珍珠
——文化动线视角下的赛珍珠现象研究

董晨鹏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5.5 插页 2 字数 453,000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51-3/I·3882 定价:4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引言 / 001

赛珍珠现象是一个演变嬗递的过程,不能简单地截取一个静止凝固的节点画面加以解剖;在空间上要考虑赛珍珠现象是一个异构多维的有机体,不能主观地选择一个维度用钻探的方式去分析有多少个层面。首先在宏观上,我们必须研判赛珍珠《大地》出版前所处的时代节点,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到底处于哪一种状态,是同化期、异化期,还是涵化期。当然,对同化期、异化期、涵化期的研判,还必须考虑到洲际之间、国别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流向。其次,在明确了整个世界大的文化动力系统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明确地研判出各种主要文化动力动线的组合。第三,赛珍珠现象本身是若干个文化动线的聚合现象,它起着承继过去,影响未来的作用。如果说文化动线各节点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立体网状结构的话,那么,赛珍珠现象则是这个立体网状结构中的两个树形结构组合:一个树形结构承载着各个文化动线对它的辐射,另一个树形结构则传导着它对各个文化动线流向的影响。《大地》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它是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第一次涵化的产物,它是世界主义的作品。

第一章 背景：“基督教世界的终结” / 013

当时的美国在经济上虽然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文化上却是块洼地,它在接受欧洲辐射的同时,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提供什么特别值得借鉴的东西。仅就文学而言,当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极其繁荣的景象之时,美国的文学作品能够在中国获得传播的可谓凤毛麟角。值得注意的是,起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赛珍珠看来,美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势力的扩张,美国人用自己的话语对西方世界的哲学史进行了重构,并把实用主义与美国

的发展成果进行了链接,那已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反对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权威,在中国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锋镝必然地会主要指向传统的儒教,这就是当初为什么会喊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历史背景。辛亥革命让当时的中国社会知道了要以“政治平等”、“思想自由”的理念来取代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则明确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以欧洲近代思想家的后继者自居的时候,他们便不可能不受到近代西方思想家蔑视神权的传统的影响,进而从逻辑上最终走向对宗教的批判态度。20世纪20年代,中国和美国一样,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显性文化都在同时接受着来自欧洲大陆的文化辐射,在接受辐射的同时,动摇着国内的传统和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基础,只不过在中国是一种狂风暴雨式的颠覆,而在美国则是一种春风化雨般的消融而已。五四时期,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已经在赛珍珠身上萌芽。当热血的文学青年追随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以“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向维护传统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孔孟儒学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猛烈的批判的时候,赛珍珠在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在中国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启蒙,而这种启蒙的结果,就是必然会对基督教文化的神性做出否定的态度。五四启蒙运动对赛珍珠思想上的改变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她摆脱了孔先生留给她的阴影,开始以阅读和写作小说为荣;二是她开始思索人的解放和革命精神的问题。当她一旦把目光投放到人间的人性上,她原先所拥有的基督的天国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

第二章 信仰蜕变:从天国到凡尘 / 029

赛珍珠在宿州期间的表现,至少能够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此一阶段的赛珍珠确实拥有着一个传教士的教条和态度,二是她对中国农村中的阴暗面有着强烈的憎恶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几年的工夫,我们会发现,赛珍珠的这两种价值倾向,最终都被她自己颠覆了,准确地讲,她最终由神性走向了人性,当她由天堂走向凡尘的时候,她又由最初的直面人性的丑恶走向了感知人性的善良。当她作出这样的选择和转变的同时,她只能是个自由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而不能做个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者,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作家。赛珍珠的困惑缘于传统与非传统、守旧与变化、精英意识与现代大众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当时面对新文化运动启蒙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本来就

没有文化传统的国家,当它的经济开始向外部世界扩张的时候,起初只能是大众生活方式的,而不可能是精英式的传播。如果说传统的中欧之间文化的交流都是精英文化和模式文化之间的交流,走的是上层交流方式,更注重的精神和制度层面;那么,美国文化对外的扩散却是通过大众生活方式进行的,是一种底层的交流方式,更多的却是物质和器用层面。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美国文化并没有树立起足够的自信,在美国社会精英的心目中,欧洲仍然是文化的中心,其评判文化高低先进程度的标尺仍然是欧洲的,这就是那个时代主流的美国文化精英阶层排斥本土成长和受东方影响的作家的关键症结所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她母亲的对信仰的放弃,对普通民众生活中美好善良人性的发现,让赛珍珠开始羽化成蝶。她很快便完成了从具象到抽象,再从历史沉淀到社会现状的审美过程。当那时的中国人用从西方取得的思想武器来争取社会婚姻的解放的时候,赛珍珠同样在用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取得的思想武器来思考西式婚姻的解放问题,只不过中国人的立足点当时是婚姻自主的形式本身,而赛珍珠立足的则是婚姻自由的本质——人性的自由。当一个女人在很深刻地思考自由的性欲的快乐的时候,作为理性化身的基督,其地位只能沦落到和观音一样,成为庇佑肉欲天堂的手段。中国古典小说只是赛珍珠的婚姻家庭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婚姻及女性自身地位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当时的中国还从另外两个渠道给了她以营养:一个是当时中国婚姻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另一个则是当时在世界上亦引起广泛回响的中国的的第一波妇女参政运动。

第三章 和而不同：东风西风的交融 / 057

简单地用“东方”与“西方”、“新”与“旧”或“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来对《东风·西风》这部小说进行研判,是远远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在赛珍珠的心目中,《东风·西风》中的文化冲突仍然是一种当时中国的本土发生的文化冲突,是一种共和政体下的现代城市主流精英文化与非主流的传统城市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她最初把书名定为《中国风》是有其道理的。这种冲突之所以激烈,是因为二者在特定的时空内,竟然都是显性的。在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中,以牺牲一方的幸福来换取另一方幸福的做法,即便占有所谓人性上的优势,但并不占有道德上的优势,自然不会被赛珍珠所完全认同,她甚至认为被剥夺了尊严的被牺牲方就是值得同情的弱者。反之亦然,占有道德上的优势但不占有人性上的

优势者,也不是赛珍珠所称道的。事实上,在赛珍珠的眼中视为正常的事物,在东方或西方的语境中都有可能被视为不正常,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直至今天,很多人运用的仍然是以自我文化为主体去观照另一个文化的方法,正如中国海派眼中的京派,或京派眼中的海派一样,其实,二者都是合理存在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东风·西风》所呈现的城市家庭中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审美意识文化层面上的冲突,更多的是爱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冲突。赛珍珠的《东风·西风》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基于婚姻家庭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多元化的文化冲突,本质上都是主观立场的冲突。这种冲突之所以会发生,都是因为以自我所处的文化环境为中心,把对方所处的文化环境作为一个陌生的“他者”来看待,用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对方。符合自己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的,则给予欣赏和肯定,不符合的,则给予排斥和否定。赛珍珠提醒我们,其实,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完全可以做到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消除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唯一方法就是消除封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积极地与他文化展开沟通与对话,消除各自对对方的误解,寻找一个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找出双方的共通之处,最终实现基于婚姻家庭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理想状态。《东风·西风》的审美意识与《美在中国》一文完全保持了一致,在特定的人这个审美对象上,赛珍珠再一次强调了她的美在于自然、美在于劳动、美在于教育、美在于发现的观点。不过,从缠脚与放脚这件事上,赛珍珠又思考到了美的相对性问题。缠脚本身体现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审美意识,是吻合赛珍珠在《美在中国》一文中所表达的美在于追求的观点的,但这种追求的美在遭遇自然、健康的要求时,便会不成其为美,或只能称之为病态之美。就当时的美国而言,在中国受欧洲影响的精英知识分子心目中,其婚姻制度是相对落后的,特别是关于离婚,采取的是判决离婚制;而当时的苏联,其离婚采取的是单方自由离婚制,结婚、离婚出于夫妇意愿,绝对自由,法律不得干涉。受苏联的影响,当时的中国也倾向于自由离婚制。正因为如此,在离婚问题上,赛珍珠觉得中国人的思想要比美国人先进20年,起码在城市中是这样。

第四章 南京事件前后：从浪漫到现实 / 091

从美国回来的赛珍珠,已经没有了《一个中国女子说》中的浪漫,她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中的阴暗面和人性中的丑恶。可以说,她已经从充满浪漫的形式上的文学革命,转向了关注普罗大众的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

从1925年秋天至1928年秋天之间,赛珍珠度过的是一个情感和心理上的苦闷期,这种苦闷既来自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来自于个人婚姻家庭的不和谐的压力,更有个人情欲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的绝望。当她相识徐志摩后,她发现爱情与欲望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如果爱情与欲望能够得到和谐地统一,传统与现代、东风与西风就都能得到和谐地统一。她因此找到了一条与当时人们不同的阐述社会冲突的理论——爱恨哲学。以《农夫老王》为基础,赛珍珠根据她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感悟,不断地把新的内容和思考添加进这个框架之中,直至整个《大地》三部曲的完成。这种创作宏大规模作品的做法,无疑是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的创作方法,不必考虑雷同和重复,只需考虑完美和吸引人。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二次大战后的冷战发生之前,赛珍珠基本是属于深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响的作家。起码在1954年之前,赛珍珠确实是亲中国共产党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以中国的反右运动发生之后赛珍珠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的变化进行评判的话,我们就很难对她以前的作品作出准确的解读。从审美意义上讲,在《回国》中乡村已经走到了都市的对立面。《旧与新》的悲剧性不在于一种文化主动挑战另一种文化的失败的悲壮,而恰恰在于一种文化被动应付另一种文化遭遇失败后的悲惨。悲壮与悲惨都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颠覆与暴力,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毫无疑问,这几篇小说都是从反思的角度,对当时中国社会上正处于文化主流的精英价值观,从平等和人道的角度进行了拷问。这种拷问是理性的,并没有政治上的冲动。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礼教的束缚一样,即便是新文化运动本身,也不能指望通过一种新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框架来重新束缚住人们。事实上,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启蒙已经向多个领域延伸。当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不仅存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兵大众的启蒙,同时也存在着工农大众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启蒙。前一种启蒙主要是文化启蒙,而后一种启蒙则主要是灵魂启蒙。文化启蒙最终走向了人性,灵魂启蒙最终走向了阶级性。按现有的价值观来看,走向单纯的人性和走向单纯的阶级性都属于走向一个极端,正如探讨单纯的感性与理性一样。

第五章 审美和归宿：都市还是乡村？ / 151

赛珍珠在美国文学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与“迷惘的一代”殊途同归

的,她同样在缔造着北美大陆的文化未来,只不过她解释的是沐浴在中国文化阳光中的过去。但赛珍珠与马尔科姆·考利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觉得不肯定中国文化对自己的影响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而后者中的某些人却从在欧洲的流浪中感悟出了美国的伟大之处,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事实上已经放弃了美国国籍。美国的欧洲流浪者与美国的流浪者的另一个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在欧洲更多地受到了国家主义的熏陶,留在欧洲的甚至成了法西斯的拥护者,而回到美国的则成了爱国主义者,当然也有一部分成为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后者在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回到美国后也大多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中有的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却很少有被称作真正爱国者的。直至1951年考利对《流放者归来》进行修订时,当时的赛珍珠也仍然并没有被所谓的雅文化圈子所排斥,更没有被“迷惘的一代”的文学鉴赏大师们所忽视。在这段文字中,考利是将赛珍珠与海明威与福克纳相提并论的。美国真正的独立的文学史应该是从“迷惘的一代”开始的。赛珍珠从本质上讲,也可以算作是“断根”的文化上的流浪者,因此,她和“迷惘的一代”一样,都是美国现代文学史的真正开创者。但美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显然不是赛珍珠和“迷惘的一代”。奠基者的荣誉要归功于1920年至1930年期间的那批作为英国文学余绪的美国作家群体。当有关美国本土的农村史诗作品的地位被奠定之后,描写非美国本土农村史诗的作家——赛珍珠地位的逐渐弱化就成了一个建构美国文学史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赛珍珠在20世纪50年代后被美国主流文学边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个写中国题材、使用中国话本发散式结构的作家如果对建构所谓纯粹本土意识的美国文学史的纯洁性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她被美国文学史的暂时抛弃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在卡津的自我设定的植根于美国本土的道德与审美的要求面前,赛珍珠确实没有立锥之地。换句话说,赛珍珠没有在当时美国文学批评家们构筑的文学史的文本上取得应有的位置,并不是因为她作品的艺术水准的问题,而是因为批评家们自我设定的取舍作品的题材与道德、审美的双重主观标准的问题。恰恰是赛珍珠作品题材和风格的中国特征,让卡津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她是当时美国文坛上的一个奇特的另类,无法定位和评述,最好加以回避。我理解爱国主义让卡津回避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赛珍珠及其作品,但我也遗憾卡津竟然没有看到,如果抛开他当时稍稍有点狭隘的美国文学特征

的话,赛珍珠的文学观及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其实正好吻合他所提倡的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或批评家的标准。卡津构筑的美国文学史从本质上讲是以精神上对美国南方的还乡之旅作为基础的,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想回到蓄奴时代的南方,而是说他在审美上确实已经找到了一个对当时所有美国国内作品进行评价的统一的标准,正是依据于这样的标准,他才能得以构筑起他的宏伟的文学史论巨著。“精神还乡”意味着回归传统、回归自然、回归人性、回归原始、回归故土、回归乡村、回归孤岛……这是20世纪自一战后开始兴起至30年代达到高潮的一股世界性文化潮流,卡津之所以被称之为美国文学史上的奇才,和他恰好能够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息息相关。正因为精神还乡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而且是当时整个世界涵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处于潮流交汇中心之中国的赛珍珠如果自觉或不自觉地紧跟着这股涵化大潮的话,她自然也不例外会走向精神还乡的旅途。有那么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能够在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的同时,又保持着与中国社会一定的距离,始终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观察和研判它,既能看出中国现代作家用革命的方式对传统文化颠覆的激情和冲动,又能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着的理想的道德标准和永恒的审美价值。这类人与需经二次精神还乡历程的知识精英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精神还乡的历程是一气呵成式的,他们首先取得的是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然后再藉以憧憬中国的未来。赛珍珠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第六章 传记和小说:传统与潮流 / 241

在赛珍珠的心目中,好的作品应该是叙述本真的自然的大众生活的,因此,忠实地描写生活本身,是艺术的神圣的功能,一切原则,一切道德理论,一旦脱离生活,便会变得毫无意义,小说应当具有生活的全部意义。正因为以生活为标准,她认为中国小说忠于生活的程度和坦率的写作方法是立足于考虑艺术技巧的西方小说所难以企及的。对20世纪30年代的赛珍珠而言,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所承担的任务是向美国传输中国文化的精华——中国的传统小说和中国的大众的本真的生活状态。以生活为标准虽然是个基本的标准,但对赛珍珠而言,她还有着另外一个标准:理想主义的标准或者叫做“文以载道”的标准。直至1954年,赛珍珠仍然认为左右美国生活的主要力量只是政治结构,还谈不上文化意义上的统一的传统和习惯。她把美国比作一个幼稚的小孩,一方面源于

文化的比较,另一方面还在于对美国本身的失望。当赛珍珠把美国的文化成熟度视作一个儿童的时候,美国社会主流知识精英的文化心理已经开始帝国化,从自信向自傲转变。赛珍珠后期的被边缘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她在政治上的美国化造成其作品非中国化的结果,是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相对先进但文化上相对落后甚至丑陋的现实将她从在中国已经抵达的精神还乡的终点重又拉回到了奔赴一线的斗士的出发点,使得她在美国的创作生涯更接近于中国的鲁迅,越来越像一个愤怒的投枪手。这本来是美国的现实造成的,与中国小说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比较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表现形式的优劣,不能简单地截取一个静止凝固的节点画面加以解剖,必须考虑到整个世界小说史的演变嬗递过程。如果就整个欧洲的文学史而言,从体裁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欧洲的小说在体制上一直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它从来就没有发展到中国小说的那种完备的程度。中国的小说是与散文、诗歌、戏剧相并列的一种体裁,散文独立于说,诗歌独立于诵唱,小说独立于说诵唱,戏剧独立于说诵唱演,演化的历史轨迹非常清晰;而欧洲的小说在本质上只是散文的一个最主要的分支而已,它在说、诵、唱、演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没有从说的层次进化到说诵唱的层面。话本小说将中国中短篇小说的体制推向了一个最完备的高峰,它的体制的完备性,仅次于戏剧,也是欧洲小说体制所远远不可望即的,它在形式上的完美性迄今难以超越。如果我们以小说中何时以平民为叙述的主角来作为一个节点用以评判一个国家的小说是否实现近代化的评判标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早在宋代,中国小说就已经实现了近代化,而西方小说的近代化直至19世纪上半叶方才实现。赛珍珠对于小说的判断是这样的:一是中国小说(东方)与英国小说(西方)各有所长,都能给美国以启迪和借鉴,但中国小说更优秀些,更接近生活的本质;二是中国传统小说是指平民大众的小说,她向美国人民介绍的和她自己创作的就是此类小说;三是近代中国小说和美国战时文学都水平不高,前者因为注重西洋(欧洲)技巧而失去了生活的本义,后者则正处于摸索之中;四是如果当代的中国小说家能够回归传统,回归生活,就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小说,这对美国作家来说同样如此。如果以浪仙的小说作参照系,我们就会发现,西方所有涉及心理分析技巧的小说都可以从他那里寻找到雏形;即便是后来的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其使用的技巧也没有超越过浪仙。中国小说在叙述者、焦点上的结构特征比西方小说要远远复杂得多。正因为叙述者叙述层次的丰富性和人物焦点的多层

义上“精神还乡”之旅。诺贝尔文学奖有关小说作品筛选的最主要的标准为：现实主义的，反映农村、农民生活的，史诗风格的，带有风俗习惯、社会道德、民间信仰、神话传说等象征符号系统的，展示社会心态和氛围以及生存状态细节的。由于在表现对象的动力性质上的一致性，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或阶层之上，在这里，我把一种并不直接反映农村和农民生活，但主要叙述某个家族、某个小城镇、某个街区世俗历史或某个人物一生历程的“世家”编码结构（包括“长河体”和自传体）的小说也视作一种准农村、农民生活题材的作品。我个人认为，贬低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实本身只会造成三种结果：一是低估了当时瑞典学院评委们的智商，二是贬低了古典小说本身的艺术成就，三是凸显了批评者自身眼光的狭隘。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的奖项，它有自己的标准，你如果看重它，你就必须创作出符合它的理想主义标准的作品来，否则，你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写作。1992年之后，中国“史诗时代”小说家群体的崛起，不仅对中国而言，对整个世界文坛来说，都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尾声 / 370

莫言的故事都是围绕着山东高密东北乡所展开的，如果把我在本书第七章中所归纳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标准与他的小说进行比照时，其共同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现实主义的，反映农村、农民生活的，史诗风格的，带有风俗习惯、社会道德、民间信仰、神话传说等象征符号系统的，展示社会心态和氛围以及生存状态细节的。让我更加难以忘怀的则是，在夏末的黄昏，我在赛珍珠和莫言的记忆中能够看到同一个说书人的背影在不停地晃动。从说书人的身上，赛珍珠发现，中国小说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要说好故事，一个好的小说家一定是能说出老百姓觉得是好故事的人。20世纪30年代时，赛珍珠自己便是这样的说书人，她也希望中国的小说家做这样的平民故事的讲述者。她等待了一个甲子以后，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和她一样的“说书者”——“讲故事的人”再次走上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讲台。从说书人的身上，莫言开始阅读社会这部大书，说书人的故事，让他的大书翻开了影响其一生的第一章。他故事素材的来源，和赛珍珠印象中的那个说书人的来源一样，恍惚之间，我以为莫言就是赛珍珠演说辞中的那个特定的说书人。一种在赛珍珠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学价值观，74年后，在莫言的身上仍然保留着。这不是一种

宿命,而是一个真正扎根于大地的现实主义作家理应具有的理想主义的人文情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赛珍珠向我们展示了她的一种世界的理想;今天,莫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具体的方式印证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轨迹。七十多年的时间不是一个轮回的周期,它只是为一个“史诗时代”奠定了更加厚实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扎根于本土的中国作家,势必会迎来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崭新的黄金时代。

主要参考书目 / 376

后记 / 382

引言

从1990年春天的第一场雪算起,我关注赛珍珠现象前后已经22年。最初,我主要协助我岳父刘龙先生做一些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试着就当时仅有的一些赛珍珠的作品进行文本的解读。前一项成果便是应当时《人物》杂志编辑翼良之邀,与我岳父共同撰稿刊载于1991年第4期《人物》上的《赛珍珠与中国镇江之缘》——在此之前,我岳父已于1990年9月29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赛珍珠与中国镇江》一文;后一项成果则是于1991年元月在镇江召开的中国首次“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交流的《惊不破的“桃源梦”——试论〈大地〉中的中国式的土地意识》。在此论文中,我指出:“在赛珍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在上面所烙下的深深的印痕。而在《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对土地、乡村的深深眷恋和对农民的诚挚感情,则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中固有的‘土地意识’,其核心便是:‘民以食为天’和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农民以土地为命根子的潜意识。”^① 上述的探索侧重于文献整理和文本解读的角度。

从1992年起,我把对赛珍珠现象的关注重点从文本解读转到了对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剖析上,最终形成的成果便是刊载于1998年《镇江师专学报》第2期上的《士的人格理想和儒家文化心态——试析赛珍珠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这是一种从文化的视角进行的比较肤浅的解读。在此文中,我指出:赛珍珠“在文化观念上有一种超越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别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持有一种平等尊重的态度;二是对本民族和本国的文化在肯定的同时又持有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反对文学民族主义;三是在文化交流上,她确立了一条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路径——主张关注实际上正是多元共存的文化现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多种文化的交流,反对暴力,反对一种文化传统对另一种文化传统的分割和颠覆。”在论文的最后,我强调:“是不是不应该由美国文学史,而是应该由中国文学史来对赛珍珠作出评述,才更为妥当些呢?”^②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12月,南京

① 刘龙:《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版,P243。

② 《镇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P27—30。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在第七章《自由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文学》中，专门辟刘丽霞撰写的《赛珍珠及其基督教文学》一节。至于把赛珍珠的作品定位于基督教文学是否精妥，可以另当别论，但把赛珍珠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确实称得上是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大胆的探索。

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试图在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给赛珍珠一个比较准确的坐标定位，但我突然发现，我很难实现这个任务。因为我必须解决这样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赛珍珠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中的定位，要解决这样的定位，我必须熟悉当时的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状态，这是两个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单一维度的问题；第二，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在当时世界上的定位，要解决这样的定位，我必须熟悉当时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动态和流向，这已经在时空上是个需要从多个维度切入的问题了；第三，作为文化媒介的赛珍珠在中美文化之间所起的作用定位，要解决这个定位，我必须了解通过赛珍珠，一种特质性的文化到底是输入了中国还是输入了美国，这种输入的文化在当时到底是先进的还是相对落后的，到底是对中国还是美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仅仅从多个维度切入显然已无济于事，我必须在每一个维度上都要采用一种矩阵式的文化动力系统的分析方式来做研判。这就是1998年之后我基本上没有有关赛珍珠现象研究显性成果的原因所在，因为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的工具。

为了解决上述三个层面的问题，我必须在时间上要考虑到赛珍珠现象是一个演变嬗递的过程，不能简单地截取一个静止凝固的节点画面加以解剖；在空间上要考虑赛珍珠现象是一个异构多维的有机体，不能主观地选择一个维度用钻探的方式去分析有多少个层面。我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在宏观上，我们必须研判赛珍珠《大地》出版前所处的时代节点，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到底处于哪一种状态，是同化期、异化期，还是涵化期。当然，对同化期、异化期、涵化期的研判，还必须考虑到洲际之间、国别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流向。其次，在明确了整个世界大的文化动力系统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明确地研判出各种主要文化动力动线的组合。研判赛珍珠现象，我个人认为至少应该把握住这样几个文化动线的轨迹：欧洲大陆、美国和中国当时的精英文化、大众（平民）文化和民间（草根）文化的动力线；欧洲大陆、美国和中国当时主流文化和显性文化的动力线。如果仅仅立足或参照一两个文化动线来对赛珍珠现象作研判，从文本解读和文化影响的角度来做功课是可以的，但想准确地给赛珍珠现象做出定位，则无异于是自说自话。第三，赛珍珠现象本身是若干个文化动线的聚合现象，它起着承继过去，影响未来的作用。如

果说文化动线各节点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立体网状结构的话,那么,赛珍珠现象则是这个立体网状结构中的两个树形结构组合:一个树形结构承载着各个文化动线对它的辐射,另一个树形结构则传导着它对各个文化动线流向的影响。

研判的思路确定了,还远远不够,我还必须知道我在研究赛珍珠现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准确地找出这个“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弄清楚这个“文化”究竟是什么,深入下去,无异于是鸡同鸭讲。自中国重新对赛珍珠进行评论和定位后,国内专家学者主要从文献、文本和文化的三个维度对赛珍珠现象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在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文本的翻译解读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标志便是刘龙主编的《赛珍珠研究》(1992)、郭英剑编的《赛珍珠评论集》(1999)和以王逢振、尚营林、刘海平、张子清等人为代表的译介成果,尤其是刘海平主编的《赛珍珠作品选集》。但从文化的角度对赛珍珠现象进行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性阶段,虽然我们几乎所有的关于赛珍珠的论文都提到了“文化”这个词。我阅读了几位博士试图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展开的对赛珍珠现象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徐清的《跨文化视界中的尴尬——赛珍珠和中国》(1999)、姚君伟的《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2001年)、顾钧的《在中美之间——对赛珍珠小说的形象学解读》(2001)、高鸿的《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2005)、陈敬的《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2006)。这些专著无疑是拓宽了对赛珍珠现象进行研究的视野,但更多的却是立足于对赛珍珠文本深度阅读后的思索,要不只是为了印证某一种文化的批判观点,要么只是从一种文本走向另一种文本的架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触及赛珍珠这个文化现象本身形成的原因与真正的后果。

我注意到了郭英剑于若干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主张,“在对其(赛珍珠)文本进行阅读的基础上,更应将赛珍珠置于东(中)西方文化局的大背景中作进一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显出赛珍珠的价值与独特性。”^①但到目前为止,在我所涉猎到的国内的相关资料中,还没有阅读到真正以这样的视角所撰写的有关赛珍珠现象研究的专著。我也注意到了彼德·康的文化传记《赛珍珠传》。他的这部专著的前言题目叫做《拂去历史的尘埃》,而我于2000年出版的专著《炮打紫石英号——中英长江事件始末》的后记中也写道:“他们如果不愿敞开心扉的话,一层层蒙在一段历史上的尘埃不会在今天被我轻轻地拂去。”^②当然,我欣赏彼德·康的

① 郭英剑:《赛珍珠研究:新问题与新走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1995年第4期, P82。

② 董晨鹏:《炮打紫石英号——中英长江事件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 P368。